

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

许 涛 梁 泽

【内容提要】 无论以历史、语言、民族、宗教等为基本领域的中亚文化研究，还是侧重于当代时政分析的中亚问题研究，中亚学在中国都属于比较年轻的学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家对外政策迫切需要的促进下，对中亚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动态关注逐渐发展起来。从研究队伍到研究成果，从资料积累到学科建设，中亚问题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中亚学的发展。中国与中亚关系发展中的现实性因素大量出现，决定了中国中亚问题研究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凸显了中国中亚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中亚研究 中国“中亚学” 研究机构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许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梁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5年前，中亚这个地理概念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很陌生的。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对中亚了解的热情和程度迅速上升。除了中国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观外，中国学术界在中亚研究领域的贡献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中亚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尤其是侧重于时政和形势分析的中亚问题研究，在中国新世纪外交、周边安全 and 经济合作需求的促进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结果不仅是中国国内社会对中亚常识的普及和认知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关系层面提供了理性而全面的知识，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了解这一重要地区提供了准确、及时的信息和建议。回顾和盘点中国中亚问题研究的发展进程，针对时代需要系统梳理已经取得的成就，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巩固与成熟应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工作。

一 中国中亚学发展沿革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地理学,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中均未出现过“中亚”这个概念。在古代中国人对世界认知不充分的“天下观”中,将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河西走廊以西广大地域空间笼统称为“西域”。这种“天下观”是中国封建社会帝王宗法制度的地缘认识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特殊方式,后来学者将其称为“朝贡体系”^①。这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对辽阔疆域和领土并无扩张和占有渴望的中原王朝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边疆治理与周边外交相结合的政策手段,其目的是在农业区与游牧区之间建立一条缓冲地带。所谓“朝贡体系”在历史实践中主要包含三种措施,一是策封,二是和亲,三是岁币,即分别从政治上(多数是名义上)、亲缘上、经济上确立所谓“羁縻”关系。恰恰是为了构建这种特殊的关系,中亚地区开始正式纳入中国中原王朝上层和学者的视野。由于地域上的遥远距离和沙漠、戈壁、山川等自然地理障碍的存在,个人和民间活动对中国人了解中亚的贡献是有限的。尽管在先秦时代的史料中已经有了关于西域风土人情的零星记载,但出现系统而精确的描述还是在西汉以国家行为对西域采取行动之后。向达在《中西交通史》中认为,“汉以后张骞凿空,发现了西域这一大块地方”,“整个中国同外族发生关系,一天密似一天”^②。受中国传统史观影响,至今仍有学者愿以中原视角将中亚地区纳入西域这一笼统的地域范畴内考察。如余泰山主编的《西域通史》即按照中国中原居民的认识习惯,将“西域”这一相对含混的地理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西域即指古代中亚地区,而狭义则仅指历史上的新疆^③。用这种视角研究中亚有其学术逻辑,建立在中国古代丰富史籍基础上的西域史研究本身,并没有将中亚与新疆作地理上或文化上的严格区分。总之,中国学术史上西域与国际学术史上中亚的地理含义,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是可以重合的,而在另外一种特定语境下又是不完全重合的^④。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① 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综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9月,第125页;梁伯华:《近代中国外债的巨变——外资制度与中外关系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李云泉:《古代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页。

③ 余泰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④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疆界、民族意识远未形成的古代中亚，以中原视角划出西北民族文化发展的主线，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思路。

中亚学作为国际学术体系的一部分，至今在中国还应算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起步应该是在苏联学术制度影响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①。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历过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和教育及科研系统的建立基本照搬苏联既有体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亚学作为一个“小众”学术门类，在苏联学者已有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成果基础上，完成了向中国社会科学的移植和本土化过程。因此，中国的中亚学发展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俄罗斯中亚学流派的色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贵阳师范学院的项英杰教授充分研究并吸取了俄苏中亚学者巴托尔德^②的中亚观，在界定中亚学研究范畴时作出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以现今中亚五个共和国，即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为主体。附带涉及其周邻的有历史上疆域盈缩关系的地区，如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西伯利亚西部、乌拉尔西部，以及我国的新疆和西藏。”^③同一时期，北京大学的张广达教授提出，“关于中亚范围的大小，学界的说法因人而异。实际上，人们也难以划出固定的、确切的范围，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政治形势来看，从四周几大文明的交互影响看，中亚的范围也确实可大可小。今天，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几个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看成是中亚的西部，而把与之毗邻的地区也包括在中亚范围以内。”^④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亚学刚刚进入中国学者的书斋和课堂时，中亚学术概念定义明显受到了俄罗斯（苏联）中亚学流派和风格的影响。但是，中国学术界并不是简单地接受了俄罗斯中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是在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又开拓出了一个重要的边缘地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开始涉足中亚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王治来教授凭借多年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学术

① 赵常庆教授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中国当代“中亚学”的形成与现状》一文中认为，中国的中亚学“基本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后起步的”。其实在苏联解体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一些国内高等学校就已经有一批学者从事中亚历史、文化、民族研究，如贵阳师范学院的项英杰教授、北京大学的张广达教授、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王治来教授（后调至湖南师范学院）等。包括中国研究中亚历史的早期成果《中亚史纲》、《中亚近代史》也分别完成于1986年和1989年，而作为国内第一种中亚学研究的学术刊物《中亚丛刊》，第一期更是在1983年就已经问世。

② 巴托尔德·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Бартольд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869—1930），德裔俄罗斯人，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中亚学家之一，也是俄罗斯中亚学的集大成者。

③ 项英杰：《〈中亚丛刊〉第1期编后记》，载《中亚丛刊》1983年第1期。

④ 张广达：《研究中亚史地的入门和参考书》，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8期。

积累,开始了中亚历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完成了《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亚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贵州师范学院的项英杰教授立足中西交通史研究,兼容并蓄苏联、法国、德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在贵阳师范学院带出一支中亚文化研究团队。北京大学的张广达教授同样吸收了俄罗斯及苏联中亚学者的成果,将自己的唐史研究作为平台涉足中亚历史研究领域。南京大学的刘迎胜教授则凭借语言优势和蒙元史研究功力,将研究方向定位于蒙古征服和统治时期的中亚。兰州大学的马曼丽教授和新疆大学的冯锡时教授凭借对俄文材料和满清史料的把控能力,填补了西部蒙古(卫拉特蒙古,中国明朝史籍中称为“瓦剌”)及准噶尔部控制中亚与新疆时期的历史研究空白。南京大学的魏良弢教授选择了对新疆维吾尔民族形成和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的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叶尔羌汗国历史,成为中国中亚学研究较高产的学者之一,并带出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各领域学术骨干的中亚学人。这些中国学者的学术活动成熟期多数都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在中亚学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中国中亚学雏形的出现,并为后来的发展与丰富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从这些早期中国中亚学研究及其成果来看,明显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各自为战,还未形成学术体系和研究梯队,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大多取决于研究者的特长与兴趣;二是多数集中于历史、文化等纯学术领域,尚难形成基本的实用研究面;三是对中亚当代问题几乎没有涉足,对中亚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似乎还难以从对苏联的整体研究中独立出来(客观讲,在戈尔巴乔夫开始以“新思维”主导改革后,中亚各共和国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剧变前的社会嬗动,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多少中国学者重视)。除了社会需求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层面外,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形成这种学术局面和学科困境的主要原因。首先,中苏关系解冻不久,中亚地区作为苏联版图的一部分相当封闭,尤其对于刚刚结束敌对状态的中国而言,中亚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地理概念^①;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不久,除了中文史料外,涉及中亚问题的俄文、英文等外国学术资料还很难正常交流,获取渠道和文献的成本都不是一般中国学者所能具备的;再次,“文革”后形成学术断层,新一代学者尚在高校和研究院所受教育,

^①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尽管中苏间学术交流已经展开,在社会科学领域互派学者和研究生时,苏联方面对中国赴苏的中亚学科学者、学生都要进行严格审查。

研究力量（尤其是外语人才）受到严重限制。

二 中亚问题研究现状

俄罗斯中亚学的发展与沙俄对中亚地区的征服和统治是同步的。同样，中国中亚学在俄罗斯学术影响下起步，其中也包含了俄苏统治中亚地区近两个多世纪的文化垄断意义。这一历史性的客观影响形成了在中国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人员大多具有俄语或苏联研究背景的现实，而且这种特色一直延续至今。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获得独立。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不仅在中国西部周边出现了清朝以来的重大形势变化，也使中国的中亚学重心由传统的基础研究转向现实问题研究。随着一个强权中心的消失，原本处于受控状态的各种地区性因素在中亚活跃起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界问题、跨界河流问题等等，成为中国外交、国家安全、经济合作等领域有效工作必须做出基本定位和判断的新课题。这一国家层面的需求大大促进了中国中亚学研究（尤其是中亚现实问题研究）的发展，并在不算长的时间里迅速充实、壮大，初步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梯队。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机构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体现为原来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机构因国际形势变化而转向针对中亚问题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亚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也有个别是此前已经将中亚确定为研究方向的（1980年成立的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7年成立的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等）和在原相近学科基础上应形势研究之需新建的中亚研究机构（如1994年成立的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第二阶段，新旧世纪之交，以中亚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频繁作乱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及九一一事件后“阿富汗反恐战争”为标志，随着国家层面需求的上升，国内高等院校纷纷将中亚纳入各自的国际问题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这一时期成立的中亚问题研究机构有：中央民族大学东干研究所（2000年成立）、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2004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新疆大学

中亚研究院（2007年在原中亚文化研究所基础上扩建而成）、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与中亚跨境民族研究中心（2008年成立）等。第三阶段，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以全球金融危机、中东“阿拉伯之春”和北约阿富汗撤军为标志，特别是在教育部指导下，各高校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建设，又有一大批中亚研究机构在国内各高校出现，其间成立的主要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2011年成立）、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2011年成立）、新疆财经大学中亚经贸研究院（2012年成立）、西北大学中亚学院（2014年成立）、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学院（2014年成立）等。

苏联解体后近25年来，中国中亚问题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科研院所还是高等院校，均产生出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基本满足了政府外交、国家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决策咨询需求。首先，是根据地缘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协助了解中亚基本情况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一类的专著有王治来、丁笃本撰写的《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沛撰写的《中亚五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马大正与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赵常庆撰写的《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中亚五国新论》（昆仑出版社，2014年），胡振华撰写的《中亚五国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邢广程撰写的《崛起的中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等。其次，与历代中国对中亚地区的主要利益关切相一致的，是苏联解体后中国中亚问题研究依然将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地区安全上^①。这一类的专著主要有：孙壮志撰写的《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和《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王桂芳撰写的《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张锡模（台湾）撰写的《中亚区域安全净评估》（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苏畅撰写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陈继东撰写的《中亚——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四川巴蜀书社有限公司，2013年），古丽阿扎提·吐尔逊和阿地力江·阿布来提撰写的《中亚跨国犯罪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相关的论文主要有：许涛的《中亚国家安全战略取向与中国西部安全环境》（《战略与管理》，1999年）和《当

^①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前中亚地区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关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安全合作的思考》(《和平与发展》，2014年)，李青燕的《阿富汗重建搅动地区安全局势》(《当代世界》，2013年)等。第三，中亚各国的独立与冷战后世界能源市场的波动期相重合，中亚地区的能源潜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也成为中国中亚问题研究的特色领域，例如：许勤华撰写的《新地缘政治：中亚能源与中国》(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张宁撰写的《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长春出版社，2009年)，徐洪峰和李林河撰写的《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柴莉撰写的《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对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第四，苏联解体使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世界性大国、国家集团以及地区性大国的影响力纷纷以不同方式渗入中亚地区。中亚各国独立后为弥补国家能力建设的不足，普遍采取了多边平衡外交政策，更使得地区各种战略力量和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加剧。针对这一特殊地区政治现象的研究也成为中国学者们关注的领域，形成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例如：王治来等编著的《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年)，孙壮志撰写的《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和《中亚国家的跨境合作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王鸣野撰写的《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亚五国》(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赵华胜撰写的《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7年)，柳丰华撰写的《俄罗斯与中亚》(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赵常庆撰写的《颜色革命在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和《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梁超主编的《中亚博弈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曾向红撰写的《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以及大量学术论文，如：潘光、张屹峰的《“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邵育群的《欧盟新中亚政策评述》(《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赵会荣的《欧盟的中亚政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8年第6期)，韩隽的《“安集延事件”后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张宁的《北约与中亚国家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3期)，赵华胜的《浅评中俄美三大战略在中亚的共处》(《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杨恕、郭旭岗的《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公共外交述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等。第五，除了地区历史以外的民族、人口、宗教、文化、政治等社会问题

的单项基础研究,也是国内中亚学界较为重视的领域。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例如:安维华、吴强、刘庚岑撰写的《中亚穆斯林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潘志平撰写的《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其主编的《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撰写的《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吴宏伟撰写的《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琪撰写的《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包毅撰写的《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季志业的《中亚民族问题及其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10期),黄陵渝的《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教》(《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1期),常玢的《苏联解体前后的中亚国家伊斯兰教状况》(《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5期),高永久、徐亚清的《论中亚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等。第六,由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所处的边缘位置和出于统一国家治理目的的领土与资源划分,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受到原有经济联系断裂的冲击。建立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是中亚各国克服现实经济困境和抵御全球化风险的唯一出路。但在目前的各国关系条件下和大国强权影响下,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使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方向长期处于纠结之中。这一曲折进程也被中国学者纳入了研究视野,主要成果有:秦放鸣撰写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朱星光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视角下的中亚地区治理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吴宏伟撰写的《中亚地区发展与国际合作机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王维然撰写的《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等,同一问题的学术论文有:秦放鸣的《中亚经济联盟的进程与前景》(《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4期),王邴久的《俄“欧亚联盟”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韩隽与郭沅鑫的《“新丝绸之路愿景”——“大中亚计划”的2011版?》(《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李建民的《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困难于挑战》(《欧亚经济》,2015年第3期)等。

在研究机构建设和个人学术成果日见丰实的基础上,国内一些中亚问题研究实体积极推动搭建了若干学术交流平台。最早创建的是“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初期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轮流主办，隔年召开一次。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等单位加盟，改为每年召开一次。2015年11月，“第十六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主办，在乌鲁木齐市召开^①。其次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亚南亚研究中心暨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每年举办的“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平台不仅汇集国内著名中亚问题专家，而且还根据主题需要邀请中亚各国学者、外交官参加研讨。2015年9月，“第十二届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美国、土耳其等国学者、官员与中国学者就“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安全挑战”、“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文明对话和人文合作”等问题进行交流^②。目前，在国内活跃的另外一个中亚问题研究的学术平台是“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亚论坛”。这个学术平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于2009年创办，隔年举办一次。虽然“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亚论坛”作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学界交流平台创办较晚，但却以国家智库的一流阵容吸引国内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大部分学者踊跃参与，并充分运用其国际影响，将中亚各国驻华使节、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官员、相关国家中亚问题专家邀请到会，实现与中国学者间的对话，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拓展更广阔的视野。2015年10月，主题为“中国与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利益、责任与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四届中亚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大学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共同承办，并首次在京外（上海大学）举行。另外，从2012年开始，新疆大学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不定期的“中亚发展论坛”。2012年6月举办了第一届“中亚发展论坛”，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中亚：转型与构建”；2013年9月举办第二届论坛，以“挑战与希望——2014年后的亚欧与中国”为主题；2015年12月举办第三届论坛，以“丝绸之路

①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边疆研究院、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琪、陈东杰、李洁、刘月华参加‘中亚安全形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暨第十六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2015年11月11日。http://nec.snnu.edu.cn/News_information.asp?bh=517&id=29

② 《“第十二届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9期。

经济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①。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联手清华大学实现资源互补,成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界又一引人注目的学术平台。同时,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于2013年8月开始举办“欧亚和平发展论坛”。首届论坛主题为“2014年撤军后的阿富汗与中亚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的中亚问题专家和来自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2014年12月,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与本校历史文化学院合办了“第二届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论坛以圆桌会议形式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地区安全”为主题,以纪念该所成立十周年的名义举行。2015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别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②。随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被评选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中亚区域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借助于该校西北史地和西域研究的深厚积累及其在西北地区的广泛学术联系,“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有望成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学术交流平台。除了上述几个专门针对中亚研究进行交流的机制化学术平台外,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年度形势研讨会也是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学者们信息和观点交流的重要场合。

三 现有问题与发展趋势

中国的中亚学研究毕竟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尤其是针对独立后中亚五国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研究,但它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已经形成相当可观的规模。这样的发展速度本身既说明中国对中亚地区关注度的上升,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因无暇及时调整而出现的问题。及时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有利于我国中亚问题研究健康发展。首先,中亚问题研究学术梯队建设尚难满足国家层面的需求。随着中亚地区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提升,专门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人

^① 《新疆大学—清华大学第三届中亚发展论坛在乌市举办》,载《新疆经济报》2015年12月6日, <http://epaper.xjrb.com/xjrb/20151206/>

^② 西安高校网:“第三届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2015年9月10日。<http://shanxishifandaxue.029g.com/daxue-232375.html>

员（不包括同时从事俄罗斯及独联体问题研究的学者）的数量与政策研究需求不相匹配。尤其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美、欧洲、俄罗斯、中东等“热门”方向相比，中亚问题研究队伍不仅显得单薄许多，而且作为完整学术研究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其次，我国中亚问题研究力量的配置明显不平衡。目前，我国中亚问题研究的学术中心或集中在京、沪等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或分布于邻近中亚的新疆、甘肃、陕西等西北省区。这种东西两头热而中间冷的格局，说明了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决策咨询需要以及西北地方区位优势是推动我国中亚问题研究发展的基本动力。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不断深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转化为国家行动，这种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的现状有待改观。第三，我国中亚问题研究队伍的基本知识结构亟待更新。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活跃于我国中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的教育背景主要是国际政治、历史、语言（其中以俄语为主）、经济等专业。中亚各国独立近25年后，地区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形势均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也与所有中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睦邻合作正在各个领域深入展开。在快速发展的形势面前，我国中亚问题研究界的人才结构已显得难以适应。传统的中亚研究方法面临更新，熟悉中亚基本情况的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专家不足正在成为目前制约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发展的短板。

中亚各国独立二十多年来，世界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针对这些变化和国家对外政策需要，中国中亚问题研究也必然将显现出一些侧重和调整，大致会呈现以下几个可能的主要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国别研究将明显加强。中亚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各国间的发展差别越来越突出，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对外政策等方面，中亚各国间原有的共性特征已逐渐被明显的差异性所代替。以往将中亚地区作为单一对象笼统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方法，难以有效把握今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线索，将中亚五国作为独立单元分别研究将成为基本方法。第二种趋势是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亚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地区，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曾经给中亚各民族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倡议在中亚各国引起强烈反响。为有效推动和保障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在各相关领域开展具体、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将是中国中亚问题研究界的重要任务。第三种趋势是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变化。多数中亚国家正值社会转型关键期和核心权力更迭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积累，构成一

定程度的发展风险。其中，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极端意识、民族关系不睦、绿洲人口膨胀、跨国犯罪活动、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均有可能导致各国发生社会政治危机。持续跟踪这些动态指标，是把握地区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切入点。第四种趋势是以新的视角观察大国中亚博弈。以世界金融危机、中东“伊斯兰国”、乌克兰危机、北约阿富汗撤军等全球和地区性重大事件为标志，美、俄、欧等大国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战略角逐的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话”机制代替了以往“人权”、“民主”方面的批评；“合作”与“援助”项目代替了直白的资源份额挤占；软实力输出代替了强势的军事存在。这些变化对中亚地缘政治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置身其中的中国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双重的变化中找准坐标，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胜任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也是中亚问题研究学人的当前任务。虽然中亚学乃至中亚问题研究在中国尚属于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它形成时的历史机遇和社会条件赋予了促使其迅速、健康发展的强劲生命力：一是中国中亚学研究的创立具有较高的学术起点，它承袭了世界各国中亚学研究和国内苏联问题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建立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一系列成熟学术成果之上。二是国际环境的巨变和国家政策的倾斜，成为中国中亚学及中亚问题研究及时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解体带来的中亚地缘政治版图大改写，国家层面的需要将中亚学及中亚问题研究推出了“小众学科”的象牙之塔。三是学科的特殊性塑造出了一支精干的学术团队，这种特殊性既包括对从业学者知识储备、语言能力、理论功底等学术水准的较高要求，也包括对他们耐心、韧性、定力等个人素质的考验。尤其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时，同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能够坚持在中亚研究的学术苦旅上一路走来，确实要面对许多现实的困难和诱惑。这些历史因素为中国中亚学和中亚问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代优秀学者以他们辛勤耕耘和无私付出开拓出了理想的学术空间，也由此赢得了无数后进的敬重。随着今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和我国对外政策不断调整，在大批新生力量的参与和推动下，中国中亚问题研究势必会迎来新的繁荣期。

（责任编辑 张昊琦）